

萬有文庫

第2集百種

王雲五主編

現代經濟思想

(四)

霍樹生譯
于門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想思濟經代現

(四)

著 霍門
譯 生樹于

著名界譯世漢

第五章 霍勃生

一 霍氏之時代情形及其生平與態度

自來對於盛行的經濟理論學說，有一輩堅持異議者流時時加以攻擊，霍勃生即為此輩中之當代表。然而霍氏不僅止於好持異議，彼自有其理論體系從而發揮之。同時霍氏對於現代經濟組織之修正，更有一具體的計劃，且認為現行經濟組織作消極的辯護，乃經濟學說之主要缺點也。吾人簡短檢視經濟學爭論對於古典派經濟學說之關係，即可見霍氏與當時思想之淵緣。十九世紀中，李嘉圖經濟學為英國最流行之經濟信仰。其對於一時實際生活之最重要關係，厥在其被取作政府不干涉政策的辯護之根據。此種政策之極受歡迎於有勢力的新興資本家與產業家，乃使其成為盛極一時的經濟信仰之重要因素。在自由貿易政策下英國貿易與財富之增長，復被

人視若此種信仰理由充足之明證。

經濟學家審慎周詳之言論，雖在創論者通常深知其假設之性質與其學說之有限的適用性，而當時之新聞記者及政治學家則輒取以爲政治的與社會的法規之根據。所謂個人自利心之自由發揮將最有益於大衆福利之說，成爲一時普遍接受的社會政策之至理；僥以爲此即控制經濟生活的「自然法則」。表面所得而見之偶然弊害，在此種思想統系之下，俱能委於自然法則之不可免的殘酷。尤以工資階級之疾苦，自較爲優裕的階級觀之，能認爲人類天然繁殖力之不可免的結果。哲學與心理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理論，以及實際工商事業中之顯著趨向，咸彙同擁護十九世紀自由主義之經濟信條。政治經濟學，不復與世事無關。而成爲一時局勢中之要物，在某種意義上可謂爲當時常識之表現。政治經濟學教授輩在其國中俱享有榮譽之地位焉。

對於流行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之異議，實際與對於自由主義派政治家之異議相關連。其異議之範圍，蓋起自此極端之爲陳古權利辯護的保守黨以迄彼極端之「新天新地」（the new heaven and the new earth）社會主義的夢想家。普通言之，此種異議係源出於一般人士之不

爲當時經濟制度之利益所感動者。彼輩主張用各種方式之政治權力以解除社會制度中彼輩所認爲深堪遺憾而可以補救的缺點。社會改革與經濟學爭論自始固有連帶關係者也。

經濟學說日後之發展，傾向於消滅此種連帶關係。就吾人此時之目的而論，殊不必研究李嘉圖經濟學何以失去其權威之勢力，或經濟理論至大約一八八〇年後何以變爲派別紛歧，而多從事於假設的學說體系之敷陳煊染。除馬雪爾之著述尙有相當現實主義的影響外，當時之趨勢實係如此。經濟學家從事於研究常態情形之「法則」或「原理」或「趨勢」，使入於各種理論體系，此種理論即謂經濟生活中之基本組織力量厥爲受享樂主義所鼓動的個人間之競爭者也。於此乃發生一奇異而反常的局面。蓋經濟理論儘繼續以個人主義爲說，而因社會組織日益複雜所發生之各種問題則引起比較有統制性或團體性的立法。若經濟學家能謂彼輩正研究經濟生活之比較基本的方面，則彼輩所從事活動之園地卻與當時之日常生活愈去愈遠矣。

在此層上，經濟學家每被社會改革家所忽視。消極方面，經濟學說未曾致疑於是否需要研究，如貧窮問題之類，雖其含義或顯爲保守的性質。積極方面，對於一般從事改革工作者，亦未予以若

何實際的或意見的助力。經濟學家以個人的立場或許對於社會改革感覺興趣，但此係由於人道主義之動機而無關於彼輩以專門經濟學家資格所發之理論。社會改革家可以謂經濟學者所致力之間問題俱非對近代社會有真正重要之間問題，實則經濟科學之概念與方法殊多阻礙其對於此等問題之解決能有任何貢獻也。

實際世事，以團體立法之方式，推進改革。經濟學說，則逗留於四週。保守派則自倫理含義中集得實力，此種倫理含義乃若干經濟學者用以解釋個人主義競爭的經濟學之分析者也。溫和之改革家或即因而卻步，激烈者則置之不理。彼輩以較為現實的方法逐一揭露嚴重的社會罪惡，而在許多方面獲得補救的立法之成立。若此種立法多僅為投機的立法方面之補牢，則最活躍而最有團結的促進此種運動之團體——費邊社(Fabian Society)——確進行於明白敷陳的社會學說與社會政策之基礎之上。該社社員多為溫和派社會主義者，以土地與產業之國有為最終目的，同時復對於當時貧窮之改良問題亦甚關心者也。

就其較遠的與較雄心的目的，費邊社諸人發揮成就一經濟生活之社會主義的組織之學說

(或可謂爲根本計劃)，其主旨 在適合英國背景。其說構成社會改造之綱領計劃，而未能與正統派經濟學說中所有關於競爭的生產，價值與分配各項之分析發生接觸。密勒氏所闡述之李嘉圖地租學說，被採以爲社會主義之論據。效用原則如耶文思所詮說者亦被採用。除此而外，與經濟學說之關係，殊無過於薄怒微噴。謂此種學說對其計劃未能有何維護。費邊派理論向未認真探討生產，價格及所得之集體統制等問題——此數端（指生產，價值及所得）在競爭的制度下之自動控制固曾受經濟學家最多注意者也。

是以經濟理論家活動於一種計劃，一方面與政治家不同，另一方面與激烈社會理論家又不同。自社會改革家之觀點視之，此種情勢，甚屬不幸，蓋此足使彼輩受人指摘謂其主張與經濟法則相反之政策。此種指摘，彼等不能不認爲不合理；蓋彼等深覺以經濟理論貶斥人類補救源於近代文明的弊害之企圖，頗足爲其理論體系之缺點之表現。然而經濟學說與社會改革間之冷漠，非俟有人致力於消彌各個的興趣範圍與思想習慣間之隔閡，難得減少也。

以上關於英國文化史一個有趣方面之簡短陳述，吾人需要之以樹立霍氏對於經濟思想之

關係。霍氏對社會改革，頗感興趣，但覺有消除社會改革及經濟學說間之罅隙之必要，并嘗試努力於此。氏之致力於此也，自某種意義言，在恢復社會改革與經濟學爭論間之昔日關係。在另一意義上，則爲試欲樹立一種新的學說體系，其學說與實際世事之關係將求其與昔日李嘉圖經濟學相似。氏志在建立一理論的基礎，以備於此放任主義（laissez-laire）已失其效用之新時代中，於其上築一公衆政策之信條。至其如何完成其工作，稍緩當再詳加檢討。

此際吾人可略一審視霍氏生平之事實數則，俾得爲明瞭其觀念之一助。氏系出於一良好上中階級之家庭，在一八七〇——八〇年中受古典學派之大學教育於牛津。此十年代表政治經濟學史中一耐人尋味之時期，亦可謂爲李嘉圖學說系統保有權威之末日。李氏之說既衰，在各種互相攻擊之勢力下，遂繼之以長期的理論之紛爭與各種經濟學說之雜陳。牛津校內，此種勢力之影響，程度不同。吾人當能了解，在「人」被崇至尊榮之地位，亞里斯多德爲人類思想所自升降之高點之學府中，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爲異方種子。然以其爲天才超越聲望至高的密勒氏所提攜，致流入此種卓越之所，故能維持其地位於不墮，以迄於此多事之十年。

牛津學府內舊派政治經濟學之衰落中有一重要因素，即當時對於改革社會之非常興趣。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曾孜孜於政治經濟學者凡二十年。雖以體弱之故在此十年中比較不甚活動，然其聲望及影響在大多數大學生中，至為濃厚。若舉此十年中牛津校內之德性的誠摯，歸功於羅氏，或亦不謬。此外則陶因比(Arnold Toynbee)，此時亦長駐於牛津。陶氏之道德的影響，終亦成爲傳統。陶氏揭橥人類互助之宗教爲其人格之表現，同時更闡發經濟學中歷史學派之意見。李嘉圖學說之沒落，與覺察英國產業發展所挾以俱來的社會弊害之意識激盪學府者同時，且與有相當關係。國中日益擴張之財富與羣衆之繼續不絕的痛苦間之矛盾，以及放任政策作爲社會公道之發動機之不復適宜，已深入此輩學生之腦海矣。

霍氏在大學肄業時代即受此種勢力之薰陶，其繼續努力也，亦以其具有此種熱心改革之精神。氏於一八八〇年離開牛津，此後七年中任教職於費佛山與艾克賽特(Faversham and Exeter)，講授古典學說。再次之十年中，氏受聘作大學課餘演講，專爲一班作工人而設者。初多關於英國文學，不久即轉而注意經濟科目。是故霍氏較早之著述，非爲在大學院之和平空氣中靜心

研究之結果，但源出於努力向工人解釋彼輩憑以謀生的產業組織之結構，而指示關係彼等物質福利的各種問題之解決。氏既同情於工人之觀點，心目中遂常有一主要問題，即如何方能改換經濟組織以增進彼等之幸福。且氏因直接受羅斯金之影響，更有一比較基本的信仰，深信英國生活因其對於商業事件之密切關心致被敗壞，並以為任何適當的進步哲學或改革方案，必須預備較大的非商業式的活動之餘地。吾人祇有認清此種種早先之勢力與興趣，始能明白領會霍氏之著述，尤以關於其各種題旨中之思想統一為最也。

霍氏之致力於社會之革新及工人階級之教育，自無所謂新穎獨到。當時之優秀分子，因良心之驅使而獻身於此類工作者甚多。各派人物之從事於革新工作者，亦不在少。霍氏之所以特出者，祇因其恰為此輩中特別注意經濟學說諸問題之一人耳。

霍氏早年問世之書，并非主要與經濟理論相關。其中兩種，討論貧窮與失業問題，係工業病理之研究。此類著述使其感覺當時經濟生活組織之鉅額浪費。其著述並提出若干問題均為經濟學說所不能助其解決者。同時氏之傑作近代資本主義之進化（*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之出版，更顯露其才思之敏捷。一八九八年所發表之論約翰·羅斯金一小冊更使對於當時各種經濟學說之異議，益如日之中天，此種異議固為氏之早年著述所已孕育者。即在其最早之作品中，亦已可見其試欲以出奇之方法，打破所謂正統派經濟學者之觀念。及至一九〇〇年分配之經濟學 (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 問世，霍氏似已確立其地位為中等階級改革家中之經濟理論家矣。

霍氏之著述，每因其聽衆及讀者之性質及其本人之他種成見而自有一種語氣。上文已經提及，蓋氏曾有一時期任課餘講演員。至一八九七年後，氏復從事於新聞事業，擔任倫敦民族報 (National) 及其他自由派報紙職務。故霍氏一生之著作，其對象之讀者範圍較廣而通俗，與專任教授式之經濟學家不同。氏之興趣，且亦不絕對盡集中於經濟理論。其報章中之作品大部分係評論當時政治問題，尤以問題中包含經濟原素甚大者。其關於社會理論之比較抽象的方面之著述，亦不得不受其討論時事的日常工作之影響。其注意之範圍既廣，對於當時之各種問題遂不禁皆發為文章焉。

此種職業對於其理論的著述之影響，約有兩層：第一，其工作使霍氏獲得若干關於社會中活動力量之知識，為普通雖最精密之經濟學家所不能獲得者。此乃生活之原料，霍氏對之加以思考，反省，推論——關於其程序其缺點及其所含之可能性。第二，因落墨迅疾，議論廣泛及取材之龐雜，致其作品有若干膚淺及修辭不能盡善盡美之憾。其鉅大熱忱與活動，吾人於其在定期刊物所發表之文字外更著書二十六冊一點上可以想像。如此而欲求其若何精深合乎學者之風格，勢非常人所能。氏之智力，散佈太廣，以致似乎薄弱不足以與學者以深切之印象。然而霍氏所欲予以印象之人，本非學者之流也。

在英國，霍氏之缺點引起專家經濟學者對彼輕視之意見。曾受馬雪爾嚴格教訓之徒，輒惡疾之。例如，佛勒克斯（A. W. Flux）歎惜其邏輯之不佳，且謂其自合理之前提終達到與「合理的思想家」不同之結論。（註一）克因斯（T. M. Keynes）則謂「擬讀霍氏新書之際，每有一種混合的情緒；希望獲得若干足資激刺的觀念及自獨立的個人的觀點而生的對於正統派之有價值

（註一）參閱佛氏所著分配之經濟學書評見經濟雜誌（Economic Journal）第十卷（一九〇〇）。

的批評，但明知其不免有甚多詭辯，誤解與邪僻的思想」。（註一）然而一班自由派改革家，溫和社會主義者，商會聯合運動者，以及其他關心改造社會組織之團體中，領會讚許霍氏之人亦頗不少。氏與當時有地位的知識界亦未嘗無所周旋。美國若干大學，請其講演，聽者皆深致敬佩，蓋其至少可以代表一種興趣的趨向於經濟學說之各問題也。在彼所遭遇之困難之下，氏竟成功如許勢力與影響，亦大不易。即令別無價值，然亦足證明霍氏欲聯絡經濟理論與社會改革運動之嘗試，曾彌補當時思想中之空虛也。

吾人若臨以辯證學爭辯之精神，不難指出霍氏邏輯中無數謬誤之例。霍氏之習於運用演繹邏輯，不亞於其他經濟學家。但吾人有時殊無法明瞭其論辯之根據，及其思想所寄托之觀念。讀霍氏經濟學說之書，吾人每惜其無清澈之觀念及不能駁詰之邏輯，是以不若讀馬雪爾理論之舒暢。再則霍氏於若干年中隨時隨地採納新的觀念，遂於不知不覺之間融會於其思想中，致與其早年之思想多無適當的關係，此點更予人一層困難。然而無論如何，吾人卻不能否認霍氏學說系統之

（註一）錄自克氏所著黃金物價與工資書評見經濟雜誌第二十三卷（一九一三）。

真能團結一氣。吾人之目的亦重在揭示其整體而非摭拾其片瑕碎疵也。

霍氏曾謂其整理經濟學說之主要動機，厥爲「在正統派英國密勒與馬雪爾之研究及激烈派馬克斯亨利喬治之學說中，俱不能尋得關於日常所見的不平等及經濟壓迫之任何可令人滿意的陳說。羅斯金日後曾出而闡明及糾正予之見解若干。再後樊勃倫開闢幾條新的途徑。」（註一）「不平等與經濟壓迫」一語，霍氏全部研究之關鍵可於此中求之。霍氏第一欲尋求一個能解釋「不平等」與「壓迫」之存在的公式，第二欲尋求一個能消除二者的社會政策。對於社會現象之原因的科學搜求，在氏之心目中，從未與改良社會病害之方法的搜求分爲兩事。氏蓋爲一欲知「所以然」及「如之何」之人也。

此種對於經濟研究之見解，致使霍氏否認社會科學之可以分開，尤以經濟學及倫理學爲然。『倫理並不「闖入」經濟事實；同樣事實爲倫理的亦爲經濟的耳』。（註二）霍氏以爲每一「如

（註一）錄自一封未公佈的信件。

（註二）社會問題（The Social Problems）六九頁。

此」必有其「應該如何」，經濟事實之重要祇在其可以明示社會如何能為其自身及其分子造成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謂之「優良生活」(the good life)。此種經濟學與倫理學之密切關係被凝為「經濟科學」(economic science)及「經濟藝術」(economic art)等語，二者在霍氏著述中非為相對的而為相輔的意義。經濟科學被目為一種藝術之隨侍，其目的為重新調整社會關係與習行使成一協調的程序，俾衆人俱得享公道。由是觀之，霍氏對於所謂「純粹經濟學」(pure economics) 必甚輕視。而氏之所以被稱為所謂「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之主要說明人者，亦可以知矣。

「純粹」與「福利」經濟學之間，自不能分出顯著之界線。任何經濟學者，無論其如何「純粹」，幾無不關心社會福利。一部分，如克拉克教授，以為最高經濟福利乃競爭制度之自然產物。一部分，如馬雪爾教授，以為彼等對於產業制度之運用的科學的檢視，可以供給一合宜的知識基礎，作為一切可能的改革之根據。更有一部分，深覺其科學之為假設的性質，承認其對於社會政策之適用性有限，於是自其科學的鑽求中分開其為人類謀福利之情緒。然而按諸實際，則經濟學家大

率俱潛心於分析在競爭制度中控制價值與所得之勢力，或立論於客觀的市場之作用，或立論於潛在於市場的主觀的心理狀況；蓋普通均認此為經濟研究之園地也。

霍氏之意以為，第一，彼輩之分析出發於未確定的關於經濟生活之競爭性質的假設上；第二，彼輩誤認其在事物安排中之職務，彼輩之目的應明為倫理的，以促進社會關係間和諧之獲得。霍氏復以為彼輩之分析必可做到此目的，若果曾出發於切實的計劃，以研究世人各種階級間物質福利不平等之原因。根據其對於世界之觀察，抱有主要的成見謂現行社會與經濟制度不能自身予人以福利，霍氏乃於其對於制度之分析中追溯其何以不能之故，然後進而企求如何或能之道。

霍氏既出發於此種成見，故特殊注意於財富之分配，冀有以發現現行財富分配所據之原則，及如何改進之以達於增益福利之目的。吾人可謂其全部經濟學說體系即以此點為中心。氏認為分析分配各項所因以決定的價格程序，檢視現行分配之社會影響，及最後發揮「福利」一語之內容均屬必須。一理論系統，於其中不以實在情形而以希望能做到的理想為立體者，若不至少示人以社會組織計劃之大綱以為具體的社會改革之目標，則為無意義。吾人此際之目的，為審視霍

氏循以達到其特殊經濟學說之論辯理路。混雜於其建設的理論之中，吾人時可發見其對於他種經濟理論之攻擊，尤以對馬雪爾與克拉克、畢古(Pigou)與韋克斯蒂(Wickssteed)所代表之派別爲甚焉。

二 霍氏之分配研究及其價值與價格學說

吾人最好首先注意霍氏對於所得的分配之分析，於其中氏揭示經濟的不平等及苦痛之原因。(註一)指細檢視霍氏之說，即將發現其在大體概念上名詞上及研究方法上得力於馬雪爾者甚多。吾人儘可謂若於馬氏一無所知，分配之經濟學及實業制度(Industrial system)之讀者，將感覺得此兩書雖非絕對不能了解，亦有晦澀之憾。馬氏所孜孜矻矻研究完成之觀念，霍氏俱視為當然。例如供求之平衡，供求之伸縮性，經常價格與市場價格之區別，以及地租概念之推廣至於其他。

(註一)關於此方面之參考，概將以實業制度(一九〇九)爲主。此中所舉學說之若干方面，在分配之經濟學(一九〇〇)及失業之經濟學(一九二二)中有更詳盡之發揮。